

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田永秀 刘 斌

内容提要 经世致用是儒家经邦治国的指导思想。道光年间再度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想仍然具有体系封闭、华夷观念浓厚以及重农轻商等传统特征。在鸦片战争的冲击下,经过经世致用派人物自觉或不自觉的探求,经世致用思想逐步实现了体系的开放、华夷观念的突破以至淡化,并始倡兴利求富。到1861年前后,经世致用思想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关键词 经世致用思想 传统 转变 中国近代 华夷观念

经世致用是指讲求儒家经学以服务于现实社会和政治的一种儒学传统思想,或称“通经致用。”它是儒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的思想体现。鸦片战争这一“千古未有”之变局,强烈地冲击着旧有的经世致用思想,使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传统向近代迈进,并于1860年前后基本完成了这一转变。本文拟就这一转变略呈管见。

—

经世致用是儒家经邦治国的指导思想。儒学的“内圣外王”之学,“内圣”指修己之道,“外王”即指经世致用。经世致用思想在封建社会的各个时期,其隐显程度各不相同。每当王朝统治衰弱、外族入侵或阶级矛盾尖锐之时,经世致用则显;反之,则隐。明末清初,满族以“夷狄”而入主中原,明朝的遗老们引以为奇耻,相继大倡经世致用,高扬“反清复明”的旗帜。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有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历史进入了康乾承平时期,统治阶级文网严密,而倡经世致用必涉时政,言时政必触忌讳,士人学者皆不敢妄谈时政,率相转向古章典籍。于是,考据学兴而经世致用却沉寂下来。

嘉道以降,清国势衰落,政治腐败,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内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外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并以鸦片来腐蚀清王朝官吏,毒害清王朝子民,使清王朝的白银如决堤之水哗哗外泄。堂堂的“天朝上国”如同一具被虫蛀空了的朽木架子。内忧外患迫使清王朝急速向“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之乱世滑落。世道的衰落使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封建士大夫的忧患意识苏醒,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政治,投向现实社会,倡言“以经术为治术”,欲以自己的满腹经纶来力挽狂澜。于是,以道光六年魏源代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为标志,隐灭已久的经世致用思想再度复兴。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道光皇帝在即位之初,就感受到其统治之危机。他求治心切,不仅对内政力

加整饬,而且三番五次地下令提倡经世致用:“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1];他强调士大夫必当“通经致用,有治人而后有治功,课绩考勤,有实心而后有实政”^[2],把经世致用当作励精图治之宝而大加宣扬。皇帝提倡经世致用,士大夫当然趋之若鹜,从而使经世致用在当时的社会思想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

崇尚经用的经世致用派的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姚莹、徐继畲、张际亮等,其代表作有《明良论》、《尊隐》、《皇朝经世文编》、《诗古微》、《书古微》、《默觚》、《说储前篇》、《金台残泪记》等等。经世致用派以匡济天下自命,讥讽时政,倡言变法,研讨河工、漕运、盐法,改革科举,切望整饬吏治、军队,严禁鸦片,谋求富国强兵。总之,凡一切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实务,均是经世致用派议及的对象。很明显,士大夫崇尚经世致用之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道光年间,再度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想仍然是儒家传统思想,带有明显的传统特征。

鸦片战争前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特征之一,是该思想体系的封闭性。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经世致用思想,它必然反映出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的封闭性特征。经世致用思想体系的封闭性,表现于经世致用派对世界的无知,与世界发展趋势的脱节;表现于他们兴利除弊之依据及方法仅借鉴于中国历史,仅从“古圣先贤”那里去寻找。

19世纪初叶,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代。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趋近结束。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得到巨大发展,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他们必然向外扩张,寻找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地。相反,道光朝的君臣们,对此却一无所知。而经世致用派人物,也无人虑及这潜在的威胁。他们以做“实事”求“实功”之务实作风,兴利除弊,改革内政,力振“乱世”而达“治世”,无暇也心去关心世界之大势,去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及野心。其中虽有包世臣于1828年在致友人信中曾对英国侵占新加坡表示过担忧:“英夷去国五六万里,与中华争,势难相及。而新埔则近在肘腋,易为进退”,“数十年后,虽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3]然而,毕竟人微言轻,并未引起统治者和封建士大夫之应有重视。因此,当英国的炮舰直抵中国大门时,朝野均“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4]这就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种以经治国安邦的主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同时,道光年间的经世致用派提倡改革内政,不论其理论依据抑或是救弊方案,均带有明显的复古色彩。当时提倡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往往认为是在复三代以前之学,复清初顾(炎武)、黄(宗羲)之学。魏源曾对经世致用作了具体的解释:“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5]而龚自珍在倡言变法时也说:“古之王者存三统,国有大疑,匪一祖是师,于夏于商,是参是谋。”^[6]弊何以救?废何以修?变何以革?《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恃前古之礼乐道艺在也。”^[7]由此可以看出,经世致用派的理论武器仍然来源于《易》、《礼》、《春秋》这些传统的儒家经典。至于具体的救弊方案,他们亦仅从传统的故纸堆中去寻觅。“今天下之计,在用申、韩之法,核名实,严刑赏;用管、商之法,理财用,强军国,若家习节俭,人怀教富,则本振而未无不举,源澄而流无不清,囊政都皆自革。”^[8]经世致用派鲜明地表示:“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取古时丹”^[9]。“古时丹”指的是什么呢?龚自珍自谓为“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10]。此乃狭而言之;广而言之,则指儒家传统中的变易思想、民本思想、今文经学中的历史进化论、历代改革家之变法方略以及清初的尚武精神等传统文化中能激扬民气的成分。道光年间的经世致用派仅以“古时丹”来疗治国之“大弊”,这不能不说是当时经世致用思想

体系封闭的局限性所在。

鸦片战争前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特征之二,是在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华夷观念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优越意识的集中体现。到了18—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远比中国农耕文明更为先进的工业文明,中国文比上的优越地位也丧失殆尽,而封建士大夫仍沉醉于天朝迷梦之中。经世致用派虽然对晚清之弊政大为不满,但面对那些“化外诸夷”,仍然自诩为天朝上国,对自己视之过高。1839年虎门销烟后,8月3日林则徐在《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中说:“洪惟我大皇帝绥抚中外,一视同仁……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我天朝君临万国,然不忍不教而诛……王其诘奸除匿,以保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自大之情溢于言词。而对外来诸夷,则一概贬之若犬羊,对于其国名、人名、船舰名一概加口字旁以示警告和蔑视,根本不去想“蕞尔岛夷”是否敢于“恫喝全盛之中华”这个有关国家民族前途的问题。1839年9月,林则徐在向道光帝上奏自己的观察结论时说:“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万不敢以侵袭他国之术,窥伺中华”^[11],认为即使义律私约夷埠兵船在粤洋游弋,也不过是虚张声势。1840年2月,林则徐接到英国12艘船将开抵粤洋的重要军事情报时,仍斥之为“谎言”,而且认为“即使果有其事,而夷兵远来,粮饷军火安能持久?我天朝水陆劲旅,以逸待劳,岂不能不制其死命”^[12]?在华夷观念的支配下,不能知己知彼,采取正确的措施来处理中外关系,以致坐失良机。作为对夷情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林则徐,尚有如此浓厚的华夷观念,其他经世致用派的人物就更不用说了。华夷观念是与封建等级制度相联系的落后的意识形态,它始终是阻碍中国人走向近代的心理障碍,也是使经世致用思想囿于传统的枷锁。

鸦片战争前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特征之三是重农轻商。重农轻商是封建社会的传统政策,它是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道光年间经世致用派的经济思想大都属于传统的重农主义。如包世臣虽很重视河工、漕运、盐政诸法,但又认为它们均非“大政”。有人问之曰:“吾子谓河、漕、盐非大政,然则大政在兵乎?”包世臣答曰:“兵事暂事也,虽重要不足当大,必言大政,其唯农乎!”^[13]包氏深研“农家利病”,一再申述“天下之富在农。”^[14]他认为国家“治平之枢在郡县,而郡县之治首农桑”,“长官之职,在兴利除弊,劝课农桑。”^[15]而龚自珍亦说:“农之始,仁孝弟义之极,礼之备,智之所自出。”^[16]他对农业改革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方案。主张实行“农宗”之法,按宗法关系分配土地,以解决耕者无田的问题。对于弃农经商者,经世致用派亦多加贬斥:“业工商则人习淫巧,习淫巧则多浮费。”^[17]经世致用派普遍有重农轻商的倾向,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古意识。当然,这在以农为本的中国封建社会,是无可厚非的。但到了19世纪,资本主义萌芽业已缓慢成长之际,重农轻商无疑起了阻碍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

总之,鸦片战争前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想未曾突破传统的樊篱,它仍按传统的老调子在艰难而又缓慢地旋转着,并未受到强烈的冲击而改变其基调,即便有标新立异之处也难脱儒统的窠臼。

二

道光年间的经世致用思想在其复兴不久就受到新的形势的严峻挑战。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以大炮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堂堂的天朝,被迫接受了城下之盟。这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震撼着清王朝的君臣们。“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

枪炮就扫地以尽，王朝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18]对此，经世致用派的反应尤为强烈。他们对鸦片战争的失败痛心疾首：“今以蕞尔英夷，去国数万里，孤军悬天堑，以恫喝全盛之中华，而所欲无不遂，所请无不得，英夷之福，中华之祸，盖俱极于此矣。”^[19]“盖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袭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而不敢较。天主邪教，明禁已久，一旦为所挟而复开，其他可骇可耻之事，书契以来所未有也。”^[20]经世致用派痛定思痛，既败则思振奋，“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愤恨，思殄灭丑虏，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秽。”^[21]他们或“寻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求制驭之方；或为御侮而兴利，“师夷长技”谋国富兵强。如是，使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发生变化。鸦片战争成为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转变之契机。而开明的经世致用派人物没有固守成法，而是审时度势，从而使经世致用思想较为顺利地向近代转变。

经世致用思想的转变是寓于经世致用派代表人物的政治实践及其著书立说的过程中的。1839年3月，林则徐奉旨抵达广州主持禁烟事宜。在与西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深感“不谙夷情”之苦。由于对敌斗争的需要，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事”，“借以探访夷情”。由此，林则徐发其端，给封闭的经世致用思想打开了一条了解世界的窄缝。他收集外国人在广州、澳门出版的各种书报，大胆延请懂英文但身份微贱的洋行买办、引水、通事等入幕，翻译西文书报。林则徐将从外国报刊上收集翻译的资料编辑成《澳门新闻纸》，又令人翻译英人慕瑞的《地理大全》，将它编辑成《四洲志》。《四洲志》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大观，它概述了五大洲30余国的地理、历史概况，重点为英、法、美、俄诸国的情形，此书成为后来魏源编撰《海国图志》的蓝本和基础。此外，林则徐还将鸦片战争前夕外国人议论中国的言论编成《华事夷言》，还请人译译瑞士人瓦特尔关于国际法的著作编成《各国律例》。通过这些活动，一方面使林则徐的眼界逐渐开阔，翻译过来的史料，“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据此，他调整了对外政策，“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22]，另一方面也使林则徐自觉不自觉地对华夷观念有所突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清朝官吏对外夷狂妄轻慢的一贯态度，重视了解夷情，并提出了“师敌长技以制敌”的主张。林则徐的这些举动在当时朝野上下以谈夷务为耻的情况下，是相当可贵的。外国人评论说：“中国政府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求考求……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23]林则徐不愧为近代中国第一位睁眼看世界之人。他率先将经世致用的“通时务”扩展到“通夷务”，使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开始跨入了向近代转变的新阶段。

和林则徐一样，徐继畲也是在鸦片战争中亲临前线抗英的经世致用派人物。鸦片战争爆发之初，徐继畲时任汀漳龙道。当英军进犯厦门时，他在辖区内积极设防，坚决低抗。清军的溃败使他甚为气馁：“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致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24]这种认识使他逐渐倾向主和，力行十年生聚十年教养之法，亦使他积极探求西方列强的虚实。鸦片战争后，徐氏连续几年在两广、福建等沿海地区为宦，为他了解海外新知，实现思想的转变提供了条件。

1844年1月，徐继畲在厦门认识了美国传教士雅俾理，徐氏从雅俾理那儿了解到一些世界历史和地理情况，并见到了“绘刻极细”的外国地图。一个月后，徐继畲又到厦门会见雅俾理，仅仅为了继续探询各国情况。对此，热衷于宣传上帝的雅俾理很失望，认为徐氏“对于获悉人间各国的状况要比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25]自此，徐氏开始精心收集资料和写作。他“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试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

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前后五年;徐氏“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26]1849年,《瀛环志略》终于稿成付梓。

《瀛环志略》全书十卷,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徐氏在此书中已认识到现实世界是多元世界,而非以“中华为中心”的“大一统”体系,各国的风俗习尚、宗教观念、价值标准各有其善,因此不能“操儒者之绳墨而议其后也”^[27]。而且西方的工商业远胜于中国,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很值得赞慕。同时,在该书的修改过程中,措词也有很明显的变化。在1844年《瀛环志略》初稿中,夷字比比皆是,以后各稿,夷字越来越少,将它或删除或改为中性字眼。综观徐氏之书,他已率先突破了迂腐的华夷观念。

紧随林则徐之后的是魏源。鸦片战争时期,他曾在裕谦府充当过幕僚,相与谋画。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他深受刺激:“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28]于是,他双管齐下,相继著成《圣武记》和《海国图志》。

1842年8月,清廷与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同月,魏源发愤而著作40余万言的《圣武记》。《圣武记》回顾了清代开国至道光初用兵之本末,目的在于探究清朝盛衰之由,以暗示鸦片战争失败之原因。魏源是以强烈的华夷观念为基调而作《圣武记》的,他渴望恢复“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的以中华为中心的统治秩序。

《海国图志》完成于道光二十二年,“夷艘出江甫逾三月”。1841年6月,林则徐被解职北上途中,在江苏京口会见了魏源。林、魏两位肝胆相照、壮志难酬的朋友,百感交集。“与君宵对榻,三度两翻频”,“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29]林则徐以自己在广州收集翻译的有关《四洲志》的全部资料交与魏源,嘱托他编纂《海国图志》,魏源欣然接受。他早就积极收集资料有志于编辑此类书籍。道光二十年秋,魏源就在军中亲自审讯了英俘安突德,了解英国的情况,后又根据台湾捕获的白夷颠林等所供的材料,编写成《英吉利小记》(后收入《海国图志》)。魏源不负朋友重托,他以《四洲志》为基础,“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又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30],辛勤编纂,终于完成了这部划时代之作。后来,魏源对《海国图志》复加增补、修定,并亲自到澳门香港等地游历采访,终于竭十年之力,“旨则数千,稿凡三易”,^[31]由最初的五十卷扩展为一百卷,成为当时中国一部最完备的知识宝库。从“知夷情”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纵论御敌之策,详细介绍世界各国之情形,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并对“夷狄”一词重新进行了解释:“蛮夷羌狄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非谓本国之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32]故对西方人不能以“夷狄”一以贯之。可见,从撰写《圣武记》到编撰《海国图志》,魏源对华夷观念已有所突破。他已经把目光从探究祖先的光荣历史转向从现实世界去寻求富国强兵的新道路了。

冯桂芬是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思想的经世致用致用派人物。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资本主义的入侵加剧。太平天国起义,扫荡了清王的半壁江山,统治阶级惶惶不可终日。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就酝酿、成书于此忧患深重之年代。他在“位卑言高”之“抗议”中,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批判了清王朝统治的死气沉沉,官吏的贪污腐化,经济上的千疮百孔,军事上的不堪一击。为此,他积极讲求“自强之道”,继承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将之发展到更深更广的层次:要求“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籍以诸国富强之术”^[33]。他认为国中的自强需要经过三个阶段:“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34]。他敢于公开承认中国的落后,要求从军事、经济、文化、政治诸方面师法西方。只有抛弃了传统的华夷观念,承认自己的不如,才有

可能真正地效法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达到自强之目的。冯桂芬的思想已经具备了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特征。因此,以冯桂芬1861年著成《校邠庐抗议》为标志,经世致用思想基本完成了向近代的转变。

经世致用思想的转变是众多经世致用派人物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由于经世致用派人物各自社会地位与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之迥异,而导致其转变的程度不同。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冯桂芬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派经过鸦片战争的阵痛,纷纷著书立说以探索自强之道。他们努力了解、学习西方,其过程,亦即经世致用思想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同时,在此过程中他们亦自觉不自觉地修正自己的思想,由此,经世致用思想不断地向近代迈进。

三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外敌的入侵,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夷夏大防”无疑为当头棒喝。而资本主义的冲击,则导致了封建经济的开始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轫。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在诸多方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的这些社会现实,从而构成了其异于传统的特征。

其一,近代经世致用思想体系是开放的。经世致用派对世界大势是基本了解的,并一致将目光转向御外,以御外来推动内政改革。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经世致用派相继走出中古封闭的黑屋,热心于边疆史地,追求海外新知,竞相“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据统计,从林则徐1841年编译《四洲志》起,到1861年,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中国人写了22部有关世界地理的著作^[35]。其中重要的有林则徐之《四洲志》、魏源之《海国图志》、徐继畲之《瀛环志略》、姚莹之《康輶纪行》等。经世致用派孜孜不倦地研讨边疆史地,探查外洋情事,显示了其冲破封闭状态,走向世界的趋势。

近代经世致用派同样看到了改革内政的必要性,不过此时他们是立足于御侮雪耻,抵抗侵略而兴利除弊的。经世致用派认为,签订和约后,中国当务之急乃是“武备之当振”,因为“夷瞰我虚实,藐我废弛”,故“其所以严武备,绝狡启者,尤当倍急于未款之时。所以惩具文,饰善后者,尤当倍甚于承平之日。”^[36]中国武器落后,应仿效西方各国,制舰造炮,“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37]然而,仅此即可驭夷乎?否!“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即是说,西方的“长技”,较之国内的政治势态,还仅是末;国内政治之优劣,才是驭夷之关键。为此,必革除内弊,要“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痛,去营窟,则人心寐患祛。”“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蒿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才之虚患祛”,“寐患祛而天日昌,虚患祛而风雷行。”^[38]这样,把内政与外交联系起来研究,不把鸦片战争的失败仅“归咎于舰炮之不若”^[39],还归源于内政之腐败,存而主张改革内政。

近代经世致用派在挽救危局的具体方策上除了“古时丹”之外又加上了“外来药”。近代经世致用思想体系的开放,使经世致用派又从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中寻找补天之石。如果说,“师夷长技以制夷”仅是从军事、技艺上“尽转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40]的话,那么“鉴诸国”,“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41],就有注意政治制度的倾向了。

其二,对传统华夷观念的突破以至淡化。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有浓厚的华夷观念,而发展到

19世纪50年代初,经世致用思想中的华夷观念已经淡化,代之而起的是对自己和外夷较为正确的认识和处理。鸦片战争中,中国的不堪一击,彻底暴露了清王朝之衰弱。经世致用派在惨痛之余,逐渐用理智的眼光来认识自己与诸夷。他们认为列强均有侵占中国之野心,即“诸夷不能无异志”,看到了敌人有或联合或分别攻我之危险:“将来(俄法英美)四国之交既固,协以谋我,或四国相斗一国胜而三国为所制,而后及于我。然四国之相仇胜于我,交必不能固,而自斗则日必不可远,可虑也。”^[42]他们认识到列强之间的矛盾,主张“以夷攻夷”。

对于西方的科技文化,经世致用派亦看到了其长处:“西人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43]西人讲究实学,经世致用派对此深有体会:“余尝至英夷舟中,见其酋室内列架,书籍殆百册,问之,所言亦与中国人相似,而尤详于记载各国山川风土,每册必有图。其酋虽武人,而犹以书行。且白夷泛海,司天文算法者甚众,似童而习之者,盖专为泛书观星以推至之地道方向远近。必习知此,乃敢泛海舟所之也。”他们赞赏西方学以致用的精神和科学态度,而认为“吾儒读书自负,问以中国记载或且茫然,至于天文算学几成绝学,对彼夷人,能无之此然愧乎?”若不急起直追,依然“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岂不“误天下国家也”^[44]。

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经世致用派亦多有赞美:赞扬美国的政治民主制度,“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合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45]称赞不设君位,不设王侯之瑞士,“瑞士,西土之桃花园也,惩硕鼠之贪残,而泥封告绝,主伯亚旅,自成卧治。”^[46]经世致用派将自己与诸夷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除了军事之外,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也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差距:“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47]他们敢于公开承认中国的落后:“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48]由此,他们主张“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49]可见,从把西方国家贬之若犬羊,到主张“师之”,确是一个质的飞跃。

经世致用派放下了狂妄自大的架子,一反对外夷不屑一顾的态度,积极学习西方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同时,对地理知识的掌握,使他们对传统的“中国者,天下之中”的概念进行了纠误,从而开始用“五大洲”这个近代的地理概念来认识和说明世界,而不再局限于“九州”“夷夏”的偏见之内。这些均表明,经世致用派有力地否定了“大一统”和“天朝上国”等陈腐观念,同时亦表明他们对近代世界各国平等关系的承认,亦即他们思想中华夷观念的淡化。

其三,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在经济方面的主张就是重商、求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缓慢成长,这反映在思想上,便是经世致用思想扩充了一部分略带资本主义色彩的内容,经世致用派开始提倡发展工商业,兴利求富。他们呼吁,在中国当时“夷烟蔓宇内,货币漏于外”的国内经济衰弊的情况下,要重视工商业:“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50]，“缓本急标”乃是对传统的“重本抑末”之有力否定。

经世致用派主张发展正常的对外贸易。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正常的对外贸易,才可以交换到西洋的火器船械,“此外,铅、铁、铜、布等有益于中国之物,亦可多运多销。”^[51]他们主张大力发展“富国大原”的丝茶,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他们主张发展正常的对外贸易,在于与夷商争利,在于使“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52]经世致用派主张“求富”,以“求富兴利”来反抗侵略。在“求富兴利”的旗帜下,他们主张不仅要购买西方的舰炮,而且主张自造;不仅主张自造船炮火器,还主张造机器;不仅主张官府设厂制造,而且允许商人设厂制造船械,发展民族工商业:“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53]他们主张在农业、纺织业中采用机器

生产：“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以治生。”^[54]“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百亩。”^[55]经世致用派对顽固派将机器诬蔑为“奇技淫巧”的看法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56]近代经世致用派一反“儒者不言利”之传统，高扬“兴利”“致富强”的旗帜，给后世的“求富”，“求强”事业开辟了道路。

经世致用思想发展到1861年前后转变为近代经世致用思想，以及后来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发展为洋务思想及变法维新思想，其根本目的——儒家以经术为治术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并未改变。经世致用思想在其转变过程中，有些传统的成份由于历史的惰性而延续了下来。

近代经世致用思想体系开放不够，是有条件开放的，这由“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可以看出。近代经世致用派虽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多有赞慕，但并未有效法西方而改造清王朝的政治制度的意向。近代经世致用思想中还留有：“华夷之辨”的色彩，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还有“善驭夷”的提法。近代经世致用派在形成之初，仍有以农为本的倾向。如魏源，他虽对资本主义有很深的了解，但仍认为农业为本而工商业为末，“金玉非宝，稼穡为宝。”^[57]同时，近代经世致用派几乎一致主动地削弱了对内弊的谴责。

在国家民族遭受侵略之际，素有匡时济时抱负的经世致用派根据时势的变化，吸收了许多近代的、与传统相悖的东西，从而使经世致用思想向近代转变。但这种转变又是不很彻底的，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的成分。近代经世致用思想成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的指导思想，它指导着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探索自强之道的尝试。虽然这些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反映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注释：

[1][2]《宣宗实录》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乙巳。

[3][14][15][17][19]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十五，卷二十五，卷七，卷二十六，卷三十五。

[4][11]《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49页，第677页，中华书局版。

[5][29][30]《魏源集》第23—24页，第781页，第207页。

[6][7]《古史钩沉论》二·四，《龚自珍全集》第23、28页。

[8]张际亮《金台残泪记》卷三，第9—10页。

[9][10]龚自珍《己亥杂诗》。

[12]《林则徐集·公牍》第188页。

[13]范麟《安吴四种书后》。

[16]龚自珍《农宗》，《龚自珍全集》上册。

[18]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页。

[20][21]姚莹《复光律原书》，《东溟文后集》卷八。

[22]梁廷楠《夷氛闻记》第68—69页。

[23][44]姚莹《康轺纪行》卷十二，卷五。

[24]《松龕先生全集》文集，卷三。

[25]Chinese Repository, 1815, Vol. X. X. P. 170.

[26]《瀛环志略》序。

[27]《瀛环志略》校定稿，卷二。

[31][32][57]《海国图志》百卷本，卷四第四十三页，卷七十六第十九页，卷六十一。

- [33][54]《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下卷。
 [34][47][48]《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下卷。
 [35]《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72页。
 [36][37][51][53][46][56]《海国图志》卷二，卷二，卷一，卷四，卷二。
 [39]《鸦片战争》丛刊本，第4册第588页。
 [40][52]《道光洋艘征抚记》，《圣武记》卷十。
 [28][38]《海国图志》叙。
 [41][49]《收贫民议》，《校邠庐抗议》下卷。
 [42]《善驭夷议》，《校邠庐抗议》下卷。
 [43]《显志堂稿》卷十。
 [45]《瀛环志略》道光戊申版，卷九，第三十四至三十五页。
 [50]《圣武记》卷十四，《军储篇》一。
 [55]《筹国用议》，《校邠庐抗议》下卷。

(本文作者均系四川师大历史系研究生，导师鲜于浩副教授)

(上接第14页)

论》中甚至还说“邪论不能惑孔墨”。直到东汉后期著名学者如张衡、王逸也都还称道过墨子。不过总的看来，随着经学的日益繁盛，墨学更加排斥不闻。

在这一学术演变过程中，董仲舒一方面把墨学作为异己思想加以排斥，另一方面则暗地里将它肢解，从而吸收了墨学中能服务于大一统帝国的成分，同时又杂取诸家部分理论于他的思想体系之中。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儒家思想的内容得到了扩展，因而更具有包容性，也更增加了它在新时期的适应性和生命力，从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4]的结果却造成了思想文化的专制，也使得正统儒学越来越难以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在这个思想史的悖论之中，董仲舒对待墨学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注释：

[1]“息”原文作“德”，此据《群书治要》所引《墨子》校改。

[2]随着汉代一般人的地位的提高，下层平民的生命价值受到肯定与保护。《孝经》即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不能滥杀奴婢的主张在汉代得到比较普遍的遵守。据《汉书·杜延年传》记载，杜曾因“官奴婢乏衣食”而被免官。历朝帝王亦多次要求释放奴婢。光武帝的诏书中甚至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可见董仲舒的主张反映了一种时代的要求。

[3]董仲舒这段话似乎更是从《荀子·不苟》而来。“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非知也，其势然也。”但荀子这种分别同异之辩的方法论也主要是从“类”的范畴加以考察，这正是对墨辩学派“异而俱于之一”的具体发展。在这一点上董仲舒可以说是通过荀子而继承了墨辩逻辑方法论。

[4]司马光《独乐园·读书堂》。